

生态扶贫研究^{*}

冷志明,丁建军,殷 强

(吉首大学 武陵山片区扶贫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贫困;生态扶贫;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章编号:**1007-4074(2018)04-0070-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61022);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ZDE025);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6A235)

作者简介:冷志明,男,博士,吉首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陵山片区扶贫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引用本文:冷志明,丁建军,殷 强.生态扶贫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4):70-75.

大多数贫困地区的两大困局是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此极为关注。能否将这二者的治理结合起来,是扶贫理论与实践要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生态扶贫正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场生动实践。

一、生态扶贫的提出

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标志着我国扶贫攻坚进入到了“精准扶贫”的新时代。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中国精准扶贫注重“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其中提出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2015年10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生态扶贫”这一思想,将对生态特别重要和生态脆弱地区实施生态保护脱贫,并将“生态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项重大举措。2016年3月1日,国家农业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2016—2020年)》的通知,国家分别在内蒙古等8个省区和河北等5个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和草原平衡奖励。依托草原补奖政策,推行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推动草牧业发展方式转变、拓宽牧民增收渠道,恢复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牧民收入水平。2016年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针对生存条件差、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护修复的贫困地区,给予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扶贫探索以大力支持。同时,开展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试点,

^{*} 收稿日期:2018-03-19

创新资金使用方式,一方面利用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聘用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为生态保护人员,另一方面,运用集体股权补偿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占用的集体土地,增加贫困户的工资和权益性收入。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体制和机制的协调,从政策调整和机制调整入手,实现体制的合理化,实现可持续减贫和区域持续和谐发展。2017年,国家扩大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新增的退耕还林任务80%安排到贫困县,优先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全年共安排护林员20余万人,帮助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2018年1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该方案把生态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大举措,以扶贫开发 with 生态保护并重为准绳,以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为目标,采取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贫方式等超常规举措,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使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二、生态扶贫的依据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前,一些学者和机构研究认为,我国贫困人口集聚分布状态与生态脆弱区具有高度一致性。李周研究认为,我国生态脆弱地区在地域上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高度重合,生态脆弱区中县域数量的75.92%、土地面积的43.33%、耕地面积的67.96%以及人口的75.86%均处于贫困县境内^[1]。章力建提出,伴随贫困人口规模的下降,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农村贫困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从贫困人口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区的分布比例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三地占比为25%、37%、38%,90年代为20%、29%和51%,进入新世纪后,上述比例进一步调整为13.69%、35.46%和50.85%;与此同时,我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显示,山区绝对贫困人口占比达50%,连续贫困群体则有76%居住在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黄土高原地区^[2]。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共同发布的《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他们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如果不立即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气候变

化将削弱中国的扶贫努力,并可能对实现长期减贫与发展的目标造成严重阻碍^[3]。乔宇提出,生态脆弱地区,是经济与生态的双重贫困,它使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状态^[4]。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后,一些专家学者从政策措施等方面研究生态扶贫问题。莫光辉从构建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体系和实现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目标两个维度,提出了脱贫攻坚战进程中绿色减贫的实现路径^[5]。张毓卿就生态扶贫中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农业废弃物缺乏有效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偏弱和人口密度逐步加大等五个方面的困境,从政策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应用、条件保障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强生态扶贫精准性提出了对策^[6]。张燕等论证了生态扶贫协同下耕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基于法政策学视角,剖析生态扶贫与耕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统合的维度与限度,依据“制度目标—制度工具—制度模式—制度基准”逻辑进路探寻耕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完善的路径,以实现制度构建体系化目标^[7]。雷明认为,稳步推进生态扶贫需要健全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即通过政策、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来激活各类扶贫资源要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态扶贫质量和效益;具体地,坚持生态扶贫精细管理,创新生态扶贫机制是根本举措,而生态扶贫机制创新又要遵循“准、精、实、效”原则,确保生态扶贫、生态脱贫能持续^[8]。李蓝提出,要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在这种扶贫观念的指引下,发展循环经济、特色产业,开发与保护并重,实现扶贫开发 with 生态保护良性互动。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从而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地区在保住青山绿水的同时,实现产业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9]。然而,如何将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相互作用的认知转化为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的政策与实践则是生态扶贫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10]。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在山西调研时强调,我国现有贫困大多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多是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贫困人口占比和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这些地区脱贫攻坚更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必须给予更加集中的支持,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开展更加有力的工作。

三、生态扶贫的理论释义

扶贫是解决当代人的公平性问题,即解决代内

公平问题;可持续发展解决这代人和下代人或下几代人的公平问题,即解决代际公平问题。生态扶贫则是将这两个看似矛盾冲突的公平问题统一在一起一并解决即解决代内公平又同时实现代际公平^[11]。生态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方略的一项重大举措,体现了绿色与共享两大发展理念的统一,是习近平新时代我国扶贫攻坚的理论创新,也是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

(一) 贫困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一种观点认为,贫困既是生态环境退化的结果,又是环境恶化的原因。一方面,生态环境退化影响穷人的生计,使其受害^[10]。另一方面,相对于富裕家庭,贫困家庭更依赖于自然资源与环境,过度或高强度的开发利用,加大生态环境的压力。而且,贫困主体因生计资本、可行能力低下,无力投入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愿意参与到环境治理,其结果是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12]。另外一种思想认为,富裕国家、富裕地区、富裕人群使穷人边缘化,这才是生态环境退化、恶化最主要的原因^[13]。我们认为,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或恶化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正如经济学研究文献强调认为,贫困主体贫困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人们应该关注一系列变量对二者的相互影响,除生态环境这一因素之外,如文化、制度、人口、市场等,这些复杂的变量在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恶化的关系中往往发挥综合作用^[14]。

(二) 生态贫困的要素

将生态贫困置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则不难发现生态贫困的构成要素应包括主体性要素(“人”)、情境性要素(“地”)和中介性要素(“业”)三大内容,并以特定的地域综合体为载体。

1. 生态贫困的主体性要素。“人”是生态贫困的主体性要素。作为贫困的一种特殊类型,虽然在内涵方面与一般性贫困有所差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和一般性贫困类似,虽然在贫困瞄准中,生态贫困的主体或对象可以是贫困个体、家庭、区域(贫困村和贫困县等),但最终主体只可能是“人”。不同学科、贫困认知的不同阶段对此给出了一致的回答。如经济学、政治学分别认为贫困是个体收入、消费和财富以及个体权利的剥夺或缺失,阿玛蒂亚·森则进一步强调贫困是个体实现和享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福利的手段,即可行能力的缺失,并将贫困的内涵从单维贫困向多维贫困推进。不过,虽然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作为主体性

要素,“人”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也是最重要的要素,但“人”仍只是“贫困”这一过程或状态的构成要素之一,要全面理解生态贫困,还需同时考虑其他构成要素以及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15-16]。

2. 生态贫困的情境性要素。“地”是生态贫困的情境性要素,并且往往是贫困产生的“触发性”要素,即生态贫困多由“地”的脆弱性引发,因而也是生态贫困中最受关注的要素。大量的研究表明,生态贫困的产生离不开“地”这一情境性要素。不过,现有的研究往往更重视“地”的自然属性,或者说“第一性地理因素”(the first nature),通常将生态贫困与自然环境脆弱划等号,认为生态贫困就是大气、水、其他物种以及土壤等具有脆弱性或由其引起。然而,“地”的社会属性,或者说“第二性地理因素”(the second nature),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也是“地”这一情境性要素的应有之义,其缺乏包容性同样也是或可能导致生态贫困。并且,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第二性地理因素”相对于“第一性地理因素”而言,更具可塑性,即在与主体性要素“人”和中介性要素“业”的互动中有较大的调节弹性,可以通过改造将其由制约性因子、致贫因子转化为生态扶贫因子^[15-16]。

3. 生态贫困的中介性要素。“业”是生态贫困的中介性要素。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业”是实现“人”与“地”互动的媒介,或者说“业”是“人地关系”的中介。作为“人地关系”不协调、不和谐的过程或状态之一,生态贫困是特定时空情境下由“地”的脆弱性或缺乏包容性引发的“人”、“业”、“地”维度上的缺失或三者之间未能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与状态。“地”的脆弱性通过制约“业”的发展,进而导致主体性要素“人”各维度上的缺失或剥夺,而缺乏自由发展的“人”又通过“业”的调适策略反作用于“地”。可见,“业”作为“人地关系”的媒介,也是生态贫困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并且是中介性要素。在表现形式上,当与主体性要素“人”对接时,“业”表现为生计活动,如种植、养殖、经商、务工等各种工作或职业类型;当与情境性要素“地”对接时,则表现为产业形式的经济社会活动,如农业、旅游业、林业、工业和服务业等。需要强调的是,“业”这一中介要素本身的缺失、单一化或者缺乏包容性,往往是造成“人地关系”不协调、不可持续或环境退化、恶化的重要原因^[15-16],因而是生态贫困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不应被忽视。

(三) 生态贫困的形成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视角,生态贫困的形成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过程,通常表现为在“地”的脆弱性或包容性缺失的诱发下,“人”“地”“业”三个层面要素负向耦合和循环累积,进而陷入“贫困陷阱”的过程。例如,从情境性要素“地”开始,若某地属于生态脆弱地区,又是边远的山区,地理资本较弱,表现为区位条件劣势或生态环境劣势明显,同时,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相对滞后,社会排斥突出,这将限制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低端、产业类型单一、产业竞争力不强,也就意味着产业的脆弱性较高、包容性较弱,中介性要素“业”的容量和质量有限,难以满足主体性要素“人”的生计需求,并将生计资本和可行能力更弱的个体排斥在外,造成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不足,这又影响生计资本的积累,生计资本积累有限同时制约了可行能力的发展,可行能力不足又进一步加剧主体性要素“人”的贫困。这便完成了从“情境性要素贫困→中介性要素贫困→主体性要素贫困”的强化过程。显然,这只是三大要素互动过程的一个向度。生计资本、可行能力的缺失使得主体性要素“人”难以参与、开拓生计活动,如受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等的制约,无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由于生产能力、发展能力等可行能力的缺失,不能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生计资本从事生计活动,这将进一步萎缩和恶化现有的产业,使得中介要素“业”更加贫困,容量不足,质量不高,包容性不强。产业的萎缩和恶化,或者停滞不前,将难以为区域提供公共投入的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硬”“软”环境建设跟不上,将不可避免地强化区位优势、生态劣势、经济劣势、政治劣势以及制度环境劣势等,即情境性要素“地”的贫困进一步加剧。于是,从“主体性要素贫困→中介性要素贫困→情境性要素贫困”实现了逆向强化^[15-16]。综合上述,生态贫困三层要素“人业地”耦合的“负向循环累积过程”得以实现。

(四)生态扶贫的机理

由上述分析可知,生态贫困即在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自然环境脆弱或人文社会环境排斥)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包括自然生态贫困(由自然环境脆弱引发)和人文社会生态贫困(由人文社会排斥导致)。因此,生态扶贫既要考虑自然生态贫困,又要考虑人文社会生态贫困,既要从生态贫困的要素层进行干预,又要进行系统性干预。针对自然生态贫困,要突出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治理;对人文社会

生态贫困,要把降低社会排斥、提升包容性、改善人文生态环境作为扶贫的重点。对要素层面的干预,则需分别针对主体性要素“人”、中介性要素“业”和情境性要素“地”维度上的缺失或剥夺及其贫困格局表现实施“靶向干预”,精准瞄准、精准施策。而系统性干预以“人”“业”“地”三个层面要素耦合互动规律为指导,以打破“负向循环累积”链条为出发点,在实施要素层面“靶向干预”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发挥各“靶向干预”措施的协同效应,将负向耦合转化为正向耦合,进而跳出“贫困陷阱”,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生态扶贫举措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重视自然生态贫困治理,而忽视对人文社会生态贫困的干预;二是扶贫举措仍主要停留在要素层面“靶向干预”阶段,系统性干预举措与方案尚不多见。因而,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下的生态贫困内涵及生态扶贫机理,当前的生态扶贫举措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升级,即向人文社会生态贫困和系统性干预升级。一方面,双管齐下,同时保护、修复和治理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强调各要素层的协同干预,即结合要素贫困格局类型,以“人业地”耦合过程中不协调之处为突破口,消除制约性因素,重塑“人业地”正向循环累积协调关系^[15-16]。

四、生态扶贫的路径

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由于“地”维度上的剥夺,其结果将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的过程和状态。因此,从自然环境脆弱、人文社会环境排斥分析入手,生态扶贫路径可体现为如下思路。

(一)面向“地”的干预措施

面向“地”的生态扶贫举措有两大主要目标,即提升地理资本和降低社会排斥。地理资本主要指生态资本和区位资本,生态资本如生态条件及功能定位,区位资本如地理区位及交通功能定位等。社会排斥主要是指文化排斥和福利排斥,文化排斥如价值观念和身份排斥,福利排斥如社会权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剥夺。就当前的生态扶贫来看,生态资本和区位资本提升的举措是多方面的。一是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加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我国精准扶贫实施的是“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17],故这些工程建设应本着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因地制宜、科学发展,精准施策、提高实效的原则进行。如通过政府引导和政策的影响,

可因地制宜地推进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风沙源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保持重点、石漠化综合治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湿地保护与恢复、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综合治理等工程的建设。二是开展生态搬迁扶贫,对居住在交通闭塞、生态环境脆弱、恶化地区的居民实施生态搬迁,恢复迁出区原始生态环境,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降低社会排斥方面,首先在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向生态贫困地区倾斜。组织动员贫困人口参与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提高贫困人口受益程度。其次要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要扩大生态贫困地区和生态贫困人口生态补偿受益程度,如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不断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机制等。另外,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生态扶贫开发、推进村村通公路工程等举措,努力于降低生态贫困地区社会排斥。

(二)面向“人”的干预措施

面向“人”的生态扶贫举措中,生计资本和可行能力提升是重点。生态贫困地区的居民往往自然资本、物资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计资本贫困,要提升其生计资本,应创新资源利用方式,如根据国家《生态扶贫工作方案》通知精神,可推进森林资源有序流转,推广经济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等新型林权抵押贷款改革,拓宽生态贫困人口增收渠道。各地方可自主探索通过赎买、置换等方式,将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区范围内禁止采伐的非国有商品林调整为公益林,实现社会得绿,贫困人口得利。推进生态贫困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将生态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农村土地资源、集体所有森林资源,通过多种方式转变为企业、合作社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股权,推动贫困村资产股份化、土地使用权股权化,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资金^[16]。可行能力提升举措一方面应从当地居民的观念提升入手,使其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加大技术培训,积极组织技术专家深入生态贫困地区开展精准帮扶活动,加大对生态产业经营大户、合作社和企业的技术指导,在生态贫困地区培养一批活跃在贫困人口身边的“看得见、问得着、留得住”的乡土专家和技术能手。加大对基层生态扶贫工作人员和贫困户的培训力度,提高基层生态扶贫工作人员的能耐,提升贫困人口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16]。

(三)面向“业”的干预措施

面向“业”的扶贫政策一方面应降低产业脆弱

性,另一方面要增强产业的包容性。其中,降低产业脆弱性方面,生态贫困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与贫困交织,我们既要关注这类地区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又需关注产业竞争力、可持续性、多样化、发展条件改善和经济活力提升等方面。从目前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应因地制宜、绿色发展,依托和发挥生态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禀赋优势,选择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市场相对稳定的特色产业,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17]。如发展生态旅游业,打造生态贫困地区生态旅游产品,发展生态旅游体验,倡导智慧旅游、低碳旅游等;发展特色林产业,在生态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市场需求前景广、经济效益好且适合在生态贫困地区种植的本木油料、特色林果、花卉等产业;发展特色种养殖业,立足生态环境承载力,发挥生态贫困地区森林、草原及湖泊水库等生态资源,积极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如林下中药材、特色经济作物、林下养殖、草食畜牧业、特色水产养殖业等生态产业。增强产业的包容性方面,一是要提高产业创造力,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当地贫困人口就业。二是要提高穷人的参与度,让当地贫困人口更多地参与到生态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来。三是要关注经济的利贫性,使穷人从经济活动中的受益程度、利益对接和利润分享等得到提升。如生态贫困地区可因地制宜地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种、养业示范基地,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引导贫困人口参与到生态特色种养殖业发展中来,通过入股分红、订单生产、合作经营、劳动就业等多种形式,建立各类经营主体与贫困人口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拓宽贫困人口增收渠道。

(四)面向“人业地”的综合协调措施

“人业地”综合协调生态扶贫治理既要面向“人”“地”“业”三个要素层,针对各要素层上的缺失或剥夺进行干预,同时要对由于“人业地”三要素耦合失调导致的生态贫困实施综合干预,出台系统性、协调性扶贫举措。现有的生态扶贫举措中,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武陵山片区等 11 个连片特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批复等作为纲领性政策文件,强调了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的系统性支持。不过,针对生态扶贫开发过程中有助于促进“人业地”协调的部门协作、地区协作等机制创新的政策文件还相对有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

强生态扶贫的指导和支持,强化沟通协作,统筹推进生态扶贫各项工作,形成共商共促生态扶贫工作合力。具体方面,一是要强化耦合的制度设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将生态扶贫与绿色发展结合起来,为贫困地区走出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的生态扶贫之路提供制度保障。二是要形成长效的利益机制。生态补偿是生态改善成果共享的回馈和平衡生态保护相关主体利益关系的经济手段。尽管近些年来国家、地方陆续出台了有关生态补偿的政策措施,但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机制建设等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主要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对生态区位重要的森林、草地和湿地等进行补助。将来,生态补偿可以作为生态扶贫实践重点探索的领域,通过建立不同层面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环境重要而生态脆弱地区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支持,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三是要整合分散的资源要素。一方面整合政策资源,助力生态贫困地区打好财政、税收、土地及金融等政策组合拳;另一方面是整合资金资源,使生态贫困地区全面建立贫困县、乡、村三级生态扶贫担保基金,统筹、汇聚和整合当前分散于各部门的各类生态扶贫资源、各级扶贫资金。

参考文献:

[1] 李周.生态敏感地带与贫困地区的相关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4(9).
[2] 章力建.发展绿色产业加速富民兴省[J].农业经济问题,1998(9).
[3] 国际环保组织与国际扶贫组织.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摘选)[J].世界环境,2009(4).

[4] 乔宇.生态贫困视域下民族生态脆弱地区减贫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5(2)
[5] 莫光辉.绿色减贫:脱贫攻坚战的生态扶贫价值与实现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16(11).
[6] 张毓卿.精准扶贫视域下赣南生态扶贫困境与优化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16(12).
[7] 张燕.生态扶贫协同下耕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完善——基于法政策学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2017(9).
[8] 雷明.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9] 李蓝.应加大生态扶贫政策扶持力度[N].中国环境报,2016-03-07.
[10] 祁新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研究述评[J].地理科学,2013(12).
[11] 雷明.论习近平扶贫攻坚思想[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1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3] Duraipappah AK.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nexus[J]. World Development,1998,26(12).
[14] Prakash S. Poverty and environment linkages in mountains and uplands:reflections on the “Poverty Trap” thesis[R]. CREED Working Paper No 12,1997.
[15] 游俊,冷志明,丁建军.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6] 丁建军,冷志明.区域贫困的地理学分析[J].地理学报,2018(2)
[17] 冷志明,茹楠,丁建军.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责任编辑:栗世来)

Researchon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LENG Zhiming,DING Jianjun,YIN Qia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Hunan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major measur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moted in our country in tackling poverty in the new er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dynamic and 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istence of ecological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defining ecological poverty as the deprivation of "land" dimens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and also the process and status of inharmonious and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tricted by the dimensions of "man" and "industry". Further, the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ecosystem; ecological poverty;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